第一部康熙皇帝的传记：《康熙大帝全传》

汪茂和 冯尔康

清朝的康熙皇帝实际在位六十二年（自1661年2月7日即位，至1722年12月20日逝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他不仅在清朝，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位地位、作用非常重要的君主。他所统治的时期约占清朝的近四分之一。在这个时期中，清朝政府成功地解决了满族与汉族之间在各个方面的关系调谐，为社会民生的安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时期中，清朝政府以雄浑的气魄和规模，对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各个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了有成效的开发和建设，成功地组织和管理了一个包含着空前众多的民族和空前辽阔的版图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并且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姿态向世界正式确定了中国疆域的轮廓。这个时期不仅对于清朝，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历史，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在我国清史研究日趋深入的今天，紧接《努尔哈赤传》、《努尔哈赤评传》、《清太宗全传》和《雍正传》等之后，吉林文史出版社又在最近出版了孟昭信同志历经多年潜心研究著成的《康熙大帝全传》。作为康熙皇帝的完整而系统的传记，这在我国还是第一部。

康熙作为一位帝王，他不同于一般的传主。他是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国家所有臣民和一切重大事务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他的思想和行动牵动着全社会。《康熙大帝全传》的主要成功之处，正是在于它以宏大的规模、恢弘的框架、丰富的内容，全面、系统向我们展示了康熙统治六十二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建设的艰辛；看到了清朝澄清吏治和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种种努力；看到政府为适应统治全国的政治新局面而调整满汉关系、政权结构、军事编制和各项方针政策的一系列步骤和成效；看到持续八年、震撼半个中国的平定三藩之役以及统一台湾战争如何获得了成功；看到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与妥善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于清除分裂势力、安定蒙古和西藏的重大作用；看到了在保卫东北疆土、抗击沙俄斗争中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军事、外交胜利。特别是所有这些展示，都紧紧围绕着本书的主人翁——康熙帝而铺开，作者处处注意挖掘史料，着力突出康熙帝在所有这些重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良苦用心、卓识远见和惊人毅力，着力突出他的最高决策作用和直接的行为推动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政府首脑，最根本性的东西是要看他如何处理他们面临的各种大事，看他如何以自己的思想、言论、行动以及他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去影响自己的国家、影响自己的时代。一部政治首脑人物传记的成功与否，关键之点也就是要看对此表现得如何。揭示领袖人物对于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的影响越是准确和深刻，就越是一部好的传记作品。在这一方面，《康熙大帝全传》应当说是基本成功的。

但是，仅仅表现出传主的社会属性和时代价值还是不够的，这只是考察传主的一个视点。帝王也是人。他除了承担着社会的职责，还有着各自作为血肉之躯的情感和生活。这些虽然都不是那么惊天动地，但却往往能够在更深的层次上展现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体现人的本质、本性。不过中国古代的帝王，史籍中关于他们私人生活和个性特征的记载，几乎完全呈现出一种与他们的功业成反比例的状况：越是昏庸腐朽，越是生活资料丰富；功业赫赫，反而缺乏生活和个性。康熙也同样遭到这个命运。《康熙大帝全传》注意了这个问题，克服种种困难，从大量的官私记载中勾稽考索，为我们真切地描述出了康熙大帝由孩童到老年的独特人生道路。他幼年时代那位富有胆识谋略的老祖母的无比钟爱和处处以帝王标准对他举止言谈所进行的严格训练，聪明饱学的苏麻喇姑对他的启蒙教育，这些就是当时外国传教士们极为佩服他的完全适合帝王身份的高雅嗜好和兴趣以及诸多美德的由来。他清除权臣鳌拜时的超人的智慧和决断，他在平定三藩、亲征噶尔丹过程中的非凡的胆魄和武勇，他对中国固有的正统理论和从西方传入的新鲜知识兼容并包的博大襟怀，他对一切知识学问的热切追求和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他对国计民生的始终拳拳之心，和对内外臣工的宽和、以及他晚年因家庭内外错综复杂的斗争带来的无穷苦恼，这些作者都作了充分、具体的描述。不仅见事，而且见人；不仅见人，而且见思想。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康熙、了解康熙时代，都

有着重要意义。这是《康熙大帝全传》第二个基本成功之处。

在史法和治学风格上，《康熙大帝全传》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学的很多优秀传统。全书自始至终主要依靠运用大量真切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表现人物,表现人物的性格、秉赋、生活道路和历史功业，虽然作者直接对于传主的功过得失着墨不多，但是传主的作为、业绩却从作品范围广阔、内容丰富充实的从容陈述中豁然全出。在这部详述康熙一生、容进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五十余万言的洋洋大著中，我们处处都体会到作者对于传主一生行事、对于与传主密切相关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的见解的透僻和评价的公允。例如康熙努力整顿吏治，史学界很多人给予了很高评价。而作者在评述了康熙为澄清吏治而大力表树、培养清官之后，指出这种作法不可能改变官民对立的状况；又如康熙在几十年间先后几百次的蠲免钱粮、赈济灾荒，史学界一向也是肯定此举的恤民；而作者则指出小民很少从中得到实惠；再如对于西藏的第巴，作者也不是象一般论著简单地斥之为“反动”人物那样，而是具体分析了他的特殊政治地位和利益所在，既辨明了是非，又入情入理。通部作品不作惊人之语、完全以朴实的文笔、详核的内容，见出作者对于历史精神的把握和学术研究的功底。在这部著作中，集中了作者对于康熙及其时代的许多独到的研究成果。例如指出康熙初年辅政时期是孝庄太后在起决策作用，四大臣辅政只是便于太后发挥作用的一种体制；指出康熙时期是有清一代满汉矛盾最缓和的时期，三藩之乱即靠此得以平定，而康熙团结汉族士大夫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南书房，同时第一次考定南书房的成立时间在康熙十年前后；指出康熙在撤藩问题上最大的失策是操之过急和简单化；指出康熙在保卫东北与对俄交涉中组织当地民众永戍黑龙江这一决策的重大历史意义；指出康熙四次出塞，三次为亲征；指出在改革旗制方面康熙的贡献不及皇太极和雍正，最值得称道的是整饬近畿及京师治安；指出康熙推崇朱熹并不是真正信仰理学，而多半是出于团结汉族士大夫的政治需要；主持修《明史》主要是政治形式与顺治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肯定前朝善政，表彰抗清志士，宣扬忠君思想，等等。在这部著作中，同时也比较充分而广泛吸取了国内（包括港、台)和国外史学界近年的最新科研成果，特别是不分知名度大小，一一予以注明，这种严谨、谦虚的治学作风更是难能可贵。

当然，就康熙这样一位地位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来说，很多问题的研究将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因而《康熙大帝全传》中有些问题尚可探讨也是很自然的事。比如对于康熙的总体评价，似乎略显匆忙，是否可以在理论上进一步有所升华，因为讲“康熙的自我评价”，“后人对康熙的评价”，似乎尚未表达出作者对传主的总体看法。从全书结构看，除了康熙早年和晚年具有鲜明的时间发展层次外，中间若干章均以问题分类，各自纵贯始终，是否可以将几十年划分为几个阶段，以展示不同发展阶段上传主历史的不同特点？任何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论、行动都存在着是非得失的客观性，但是有些问题在个人因素的背后，是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如风闻言事之制何以在康熙时期屡禁屡行？这里有康熙个人的原因，但更根本的还在于言官制度从来都是贯彻和实现君主意志的工具，风闻言事之可行与否，完全视君主的爱憎、视多个不同时期统治集团上层的具体斗争态势为转移。又如康熙整饬吏治以高级官员为重点，这表明了他的一定政治卓识，可是问题追到督抚、部院大臣仍是不够的。康熙就曾亲口暗示一个巡视地方的清官应向地方大吏馈送礼品。因此，督抚、部院大臣还不是问题的终结，君主本人（包括象康熙这样难得的有为之君在内）、专制政体才是各种腐败现象的真正根源。对此我们只能从社会制度上做总体的考查。

总之，我们祝贺作者的成功，同时感谢作者的辛勤劳动。